

论伊格尔顿批评观的演变

◎罗 婧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伊格尔顿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批评观有一个不断转变发展的过程，具体呈现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的读法》两部著作中。前书主要想表达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的理论观点，后书主要展现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变化，体现了伊格尔顿在批评观上从“政治批评”到“形式-政治”批评的转变。

【关键词】伊格尔顿；批评观；政治批评；形式-政治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4-003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4.010

一、非政治批判中的政治性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伊格尔顿并没有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批评观点，而是对以往出现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流派进行“症候式”的解读。伊格尔顿在完成对以往文学批评理论的“破”之后，再来“立”自己政治批评的观点。20世纪许多学者都认为形式主义批判远离意识形态，是纯文学批评，而伊格尔顿认为没有纯而又纯的文学，也没有纯而又纯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于是他在解构以形式主义为代表的理论的过程中构建他的政治批评理论。

(一)对形式主义的批判

新批评属于形式主义批评，主张通过对一部文学作品（主要是诗）的“细读”来看这本作品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作品的。对待新批评，伊格尔顿对首先对它的产生背景进行了一顿耐人寻味的剖析。他认为新批评运动有着自己的经济文化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新批评家们力图寻找科学理性主义的“美学替代物”。这里呈现出了一对二元对立，分别是科学理性主义和属于人文主义的“美学替代物”。伊格尔顿想说明的是，新批评流派的出现与充满廉价小说、异化劳动的社会直接相关。正因为对文学作为“最后一片净土”保持着幻想，他们才会斩断文学与读者和作者的联系，把文学看作一个自我封闭的物体而存在。

新批评的这种理想在伊格尔顿看来是一种幻想，他们想要打造一处审美“乌托邦”，却反复在成为科学理性主义的“共犯”边缘徘徊。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新批评对形式的强调本身就并非如他们所言那么纯粹，究其实质，是当时处于困顿之中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体现。

其次，新批评家们反对技术主义，但是他们在文学批评的具体操作上又采用了这种技术主义。比如他们在批评

文章时，采用他们所提倡的批评剖析技术，搜寻文章中出现的“张力”“含混”，进而阐释文章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技术主义的影子。

最后，新批评家们虽然声明要反抗“物化”的社会秩序，但是却将诗过分的物化，把诗变成一种自我封闭，神秘地的完整无缺的偶像。而且，他们的反抗没有把矛盾激化，反而促进矛盾消融，提倡一种矛盾消融后的统一。且看他们的批评实践，极力搜寻文本内涵与文本外延之间的矛盾，但最后知识为人证明文本的坚固结构最后是怎样把它们消融为一体的。

总而言之，伊格尔顿并不认同新批评提倡文本中心主义，就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反之他们的提倡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

形式主义到了结构主义这里得到了新发展。结构主义者试图创造出更科学和系统的理论。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他们强调“关系”，认为任何事物具有意义仅仅是由于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我们对于这些单位意义的解释只需要注意这些关系而不是外在于它的现实。并且在这些关系（平行、对立、转换等）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主义者往往以这个为切入点，找寻文本的深层结构。如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理论和符号矩阵理论，都是以二元对立为切入点来建构叙事模型。

伊格尔顿注意到，结构主义从历史逃向了语言，这种走向并不是只是语言研究发展的结果，而且是社会影响的结果。这与19世纪和20世纪后期人们感到语言的堕落，力图拯救语言，恢复语言被剥夺的丰富性密切相关。所以，和新批评一样，伊格尔顿通过追溯结构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向我们呈现了结构主义和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

那么伊格尔顿是如何批判结构主义批判本身的呢？伊格尔顿对此持着辩证的想法。

一方面,他认为,结构主义走向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首先,他们去除了文学的神秘性。不同身份、性别、天赋的读者接受一定的训练都可以从不同身份、性别、天赋的文学家的作品中挖掘出深层结构。其次,他们破坏了文学人文主义的经验主义。揭示经验是结构的结果,现实与我们对于现实的经验互不相连。

另一方面,他认为结构主义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对世界意识,却始终不把眼光放在物质世界上,反而还把物质世界关在门外:一部作品的“表面”仅仅成为深层结构的顺从反映。语言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牵涉人类主体和他们的意向,离开语言活动所处的实际语境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一句话。就比如说,难道我们学习了列维-斯特劳的神话研究,就完全了解了神话,不用再阅读具体的神话作品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而伊格尔顿更加赞成巴赫金的观点,认为语言一方面不能仅仅被归结为社会场域中利害关系的反映,也不能完全脱离包含着政治系统、意识形态、经济系统的社会利害关系。

其实,伊格尔顿认为结构主义本身事实上是包含了社会和历史的意义理论的——符号系统在文化上是可变的,但是因为结构主义认为支配这些系统的深层规律是不变的,所以这种社会和历史的意义理论始终无法成长。

(二)“政治批评”理论的建构

通过一番考察和论证,伊格尔顿认为我们已经考察的文论都具有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不是强拉进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而是一开始就存在。在19世纪,文学理论就显示出对现代意识形态的逃离,但是伊格尔顿认为:“在此举动中,文论也经常暴露出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同谋关系。它认为那些用于文学作品的‘美学’或‘非政治’语言是很自然的,但就是这些语言流露出它的贵族主义、性别歧视或个人主义”^①。并且文论的政治性不应该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不承认文论与政治相关以及有意无意地加强政治制度的假定的文学理论。

伊格尔顿由此得出结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非政治”批评只是一个神话,它更有效用地促进文学的某些政治用途。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践行这种政治批评呢?伊格尔顿从文学本身开始谈起。他认为我们最好把文学视为一个可以搬动的名称。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出于不同的理由把这个名称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处在福柯所说的“话语实践”之中。“它不把话语和作品仅仅视为进行美学沉思或无限解构的文本对象,却将它们视为与作者和读者、演说者和听众之间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的形态,脱离其根植的社会目的和状况它就多半不可理解”。对于文学,我们要研究的是话语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及如何产生这些效果。这与修辞学相关联,但不是说要去复活古代的修辞

学术语,而是要吸收古代修辞学的这样一些特点:既关注形式手段又关注受众反应,既专注于权力形态和欲望形态又关注改造事业的信念。在这一过程中实质上就把以往出现过的形式主义、接受理论、解构批评、精神分析理论等联结了起来。这就把问题的争论从文学是否应该与历史相关联转向了“历史本身的不同解释”。

对于哪一种政治更可取,伊格尔顿认为这个问题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只能去辩论政治。先看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再看那些方法和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些目的。我们在理论上选择与拒绝的东西取决于我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伊格尔顿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坚持方向,他在《批评家的任务》当中将“参与大众对文化的解放事业”作为社会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

二、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转变研究思路,开始从政治领域转向对文艺领域的关注,想要借助与意识形态有着复杂关系的文化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批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庸俗马克思主义将政治抬到了过高的位置,从而阻碍了文学以一定的技巧策略否定现实的功能。伊格尔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是更充分地阐明文学作品;这意味着要敏锐地注意作品的形式、风格和含义。但是,它也意味着把这些形式、风格和含义作为特定历史下的产物来理解”^②。这表明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更加注重的是批判的政治性,而并没有明确地谈到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这种联系。在后来《文学的读法》一书当中随着伊格尔顿思想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联系。这一过程展现了伊格尔顿的批评观从政治批评到“形式-政治”批评的转变。

(一)文学形式使意识形态成为不在场的存在

伊格尔顿辩证地看待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两者不可割裂开来。他的这种态度贯彻《文学的读法》一书始终。在第一章伊格尔顿直接指出“文学研习者最常见的谬误,是直奔诗歌或小说的内容而去,将表达方式的方式抛在一边。这种阅读方式搁置了作品的文学性……说到一部作品的文学性,少不了要从表达方式来看所表达的内容。在这类写作中,内容与表达内容的语言密不可分。”^③也就是说,我们在批评一篇文章的时候,一方面要关注文学的内容以及内容的意识形态因子,另一方面要关注文学当中的语气、句法、节奏甚至标点符号等形式。形式在文学当中同内容共同构成文学的存在。

以伊格尔顿对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的批评为例。他首先分析了这部小说开头的前两个从句、首句的诗歌词组,认为这段文字结构精妙、笔法老道,秉承着传统的英伦风格,目光犀利却也不动声色地与描写对象保持距离。

其次是语气，伊格尔顿分析了福斯特在文中所写的“这段恒河恰好算不上神圣”的三个头韵，认为这显得太过于油腔滑调，“代表了一位世故而多疑的外国人对印度宗教信仰的讥讽”^④。以及福斯特把寺庙描写为“清冷”，这一形容词“让人觉得神庙不是给居民朝拜的，而是让游客开心的”^⑤。原本福斯特想要用修辞让自己与破烂的印度城市保持距离，但在语气中时不时地透露出他的傲慢。最后，伊格尔顿分析了小说开头所表现出的内容意旨，认为福斯特这段对印度城的描写可能是为了打消人们对于异邦的浪漫想象：“他们所期盼的是神秘之异域，看到的却是污秽与垃圾”^⑥。福斯特的这本书发表于1924年，这个时候印度正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即使他在书当中尽量表现出一种疏离感，即使他对帝国主义持强硬的批判态度，我们也很难不把福斯特的这段描写与他的帝国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因为虽然文学形式可以把意识形态内容进行审美重铸和转换，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不在场的存在，但是表现为不在场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这是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辩证关系的一种体现。

（二）意识形态转化为行动体验渗透于形式之中

伊格尔顿曾表明，文学作品“不只是解释它们的象征手法，研究它们的文学源流，给书中的社会史实添加脚注。首先是要理解这些作品与它们所处的意识形态世界之间的曲折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出现在‘主题’和‘中心思想’中，而且也出现在风格、韵律、形象、质量以及形式中”^⑦。这就是说，在得出文学作品的中心主题之前，意识形态就已经渗透在文学形式之中。它由信仰转化为行动、情感，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读者。在《文学的读法》三章谈到叙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待叙事有着不同的态度。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是完整的、有秩序的，因而文学作品的完整叙事是对现实的真实表达。现代主义的态度反之，认为现实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哪部作品能够单纯地反映现实。一切所谓现实主义写作，都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对现实进行改写”^⑧，所以完整的叙事是不可能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现实矛盾激化，人们的精神动荡不安，非理性主义思想盛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现实主义文学转向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叙事由此变得零碎。

意识形态渗透于形式除了表现在文学思潮中，还表现具体作家作品中。以伊格尔顿对弥尔顿的诗作《利西达斯》的批评为例。《利西达斯》是一首为悼念溺水身亡的诗人爱德华而作的悼亡诗。弥尔顿以华丽的辞藻营造出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在伊格尔顿看来更多是才华而不是情感的流露，因为诗人和其友人的关系并没有非常密切，而且两者对于皇室政见不一。在这种出于仪式而不是真情的驱使

下，《利西达斯》的行文非常的理性，如开头所写的“再一次，……再一次”，“死去了，死在青春绽放之前”，这些文字充满了回声与反复，就像丧钟的回声。所以，这篇文章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已经在我们理解这首诗之前渗透于这首诗的语言策略之中。语言策略也就是作品的形式，与作品的内容相互交融，联系密切。

三、总结

伊格尔顿在前期通过对以往批评理论的批判，建立起了“政治批评”，着力于把握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一切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但是到了后期，伊格尔顿的思想不断变化，他开始着力探寻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仅仅把文学当中政治附庸的存在，认为文学形式使意识形态成为不在场的存在，并且意识形态转化为行动体验渗透于形式之中。这展现了伊格尔顿在批评观上从“政治批评”到“形式-政治”批评的转变。这一批评观的转变，从侧面上反映出了伊格尔顿思想体系的复杂性以及发展性，要求学者们用历时性的眼光去把握。

注释：

①特里·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②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③特里·伊格尔顿著，吴文权译：《文学的读法》，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④特里·伊格尔顿著，吴文权译：《文学的读法》，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⑤特里·伊格尔顿著，吴文权译：《文学的读法》，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⑥特里·伊格尔顿著，吴文权译：《文学的读法》，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⑦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⑧特里·伊格尔顿著，吴文权译：《文学的读法》，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

参考文献：

[1] 特里·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 伍晓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 特里·伊格尔顿. 文学的读法 [M]. 吴文权译.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21.

[3]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M]. 文宝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4] 王伟. 话语实践与政治批评——伊格尔顿文学观误读辨析 [J]. 学术评论, 2017, (02): 84-91.

[5] 蒋继华. 论生产性批评 [D]. 扬州大学, 2014.